

冷戰迷霧中的「鄉土」：

論舒巷城 1950、60 年代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

陳建忠

摘要

舒巷城（1921-1999）確立了二次大戰後香港的本土書寫傳統，這點已逐漸被評論家所公認。本文試圖考察，這種重新肯認「家」、「鄉」的書寫角度，所形成的地誌書寫特色，地誌中對於「家」與「鄉」的描寫，究竟形成怎樣的藝術魅力？又要如何放置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初期的時代氛圍中加以詮釋，藉以說明鄉土作家所展現的本土意識？

從舒巷城作品可以看到香港的本土文學傳統中，存在著一個非左翼、非右翼，同時又是殖民者缺席的「鄉土」空間。舒巷城文學的意義，正在於默默持守香港作為「家園」的基本價值。當意識型態話語在冷戰氛圍中滿天亂飛之際，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便像是定風石與引路旗，讓追隨者可以順著來路知道自已的身世。於是乎，讀者才能在每一次閱讀舒巷城小說時，一再確認家園香港的容顏，也就是確認故鄉的恆在，此在！

關鍵詞：舒巷城、地誌書寫、鄉土、本土、冷戰

2013/03/26 收稿，2013/06/07 審查通過，2013/08/08 修訂稿收件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修改意見，謹此致謝。同時，要特別向樊善標教授、馬輝洪教授、陳智德教授等學者表達謝意，感謝三位於撰寫論文期間的往來切磋、指正，提供香港本土觀點以供思考，讓本文論述得以趨於完善。

** 陳建忠現職為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The Native Land” in Foggy Cold War: On Shu Hsiang-Cheng’s Topographical Writing and Na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Chen Chien-chung

Abstract

It has come to be commonly recognized among the critics and reviewers that Shu Hsiang-Cheng (1921-1999) establishes the genre of native writing for the post-war Hong Ko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how Shu in his topographical writing of Shu depicts “home” and “homeland” and presents his na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from the 1950s to the early 1960s. In Shu’s work, the idea of “native land” is neither left-winged nor right-winged, and this home land is a space where colonizers are absent. His works preserves and showcase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Hong Kong as “homeland” which the reader may confirm by themselves while reading them.

Keywords: Shu Hsiang-Cheng, topographical writing, homeland, native land, cold war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一、前言：香港作為家園與鄉土

同樣作為「華語語系文學」¹的成員之一，僅就二戰後（1945-）為時間範疇，香港文學與臺灣本地的學界、文壇其實關係匪淺。且不說兩地往來留學、講學的交流（如鄭樹森、李歐梵之例），即令作家之間早就已展開過頻繁的借鑒、合作活動，跨域的出版與發表更是不在話下。²然而，這些既有的事實在前，並不意味香港文學之特點與意義已為我們所理解；相反地，此間的學界仍有待積極認識香港文學，以期釐清華語語系文學在全球發展下的諸多差異性。

筆者關注所在則為冷戰時期的香港作家，特別是 1950、60 年代，中國因內戰南來的流亡作家湧現及香港本地作家之逐漸崛起，正當國際與國族情勢變化萬端之際，文壇秩序與作家創作都歷經極大衝擊。由此問題出發來研究香港文學，實在也可以和臺灣戰後的文學發展互為對照，更增添了比較研究與東亞整合研究的議題性。本文便希望以「作家論」的型態，先行開展筆者個人對香港華語文學的探究，希望能在時代語境中細讀作家文本，逐漸深入香港作家的文心，如此或能逐漸累積出具有臺灣學術關懷的香港文學研究。

香港重要的前輩作家舒巷城（1921-1999）確立了戰後香港的鄉土書寫傳統，這點已逐漸被評論家所公認。如許翼心便認為他的鄉土小說、抒情散文、都市詩抄，「都無不具備淳厚的地方色彩與獨特的個人風格，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最具特色的『香港的鄉土作家』，對於同時代的青年作者，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³

¹ 史書美認為，華語語系文學之存在說明了華語文學在全球發展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並非「中華離散」（Chinese diaspora）可以一語以蔽之，除她舉出的馬來西亞華語文學，香港文學無疑也並可納入這樣的理論框架中思考。相關理論闡釋，請參見史書美 Shi Shumei：〈理論·亞洲·華語語系〉“Lilun, Yazhou, Huayu yuxi”，《中國現代文學》*Zhongguo xiandai wenzue* 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39-58。

² 須文蔚曾經在其研究中指出，1960 年後《香港時報·淺水灣》曾刊登許多文藝理論之譯介文章，可以在臺發行；1968 年，十月出版社將《淺水灣》上之譯文編成《現代小說論》在臺灣出版，跨區域傳播的現象影響了臺灣文壇。請參見須文蔚 Xu Wenwei：〈意識流理論在臺港跨區域文學傳播現象探討〉“Yishiliu lilun zai taigang kuaquyu wenzue chuanbo xianxiang tantao”，陳建忠 Chen Jianzhong 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Kuaguo de zhimin jiyi yu lengzhan jingyan : Taiwan wenzue de bijiao wenzue yanjiu*（新竹[Xinzhū]：清大臺文所[Qingda taiwensuo]，2011 年），頁 435-453。

³ 歷來，運用「鄉土文學」此概念來討論香港文學者，多為中國大陸學者。本文基本上認為舒巷城的漁村生活書寫頗具鄉土氣息，但其不少以城、巷為範疇之作品確實並非既有

同時，舒巷城不僅是文本中充滿地方色彩的香港作家，他更對家園存有一種濃厚的本土情結、本土情懷。因此，此處所指之「地方」，正不是相對於某種中央而言的地方，更指涉一種在地認同的意味。蔡益懷曾經以「吾土吾鄉情懷」，探討過舒巷城早期小說中（主要以《太陽下山了》為中心）的本土情結，敏銳地指出小說中充滿了對生養之地的感情，寫出地道的港人生活，「而其深層的底蘊就是——本土情懷，正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吾土吾鄉情懷，令舒巷城筆下的香港充滿了地方色彩。」⁴

的確，舒巷城小說中具有本土情結、地方色彩，都是其小說於 1950、60 年代香港文學史中具有重要價值之所在。論其原因，恐怕是由於同一時期香港文學傳統中由中國大陸「跨界」而來「南來作家」身影過於巨大所致（如葉靈鳳、張愛玲、蕭紅等皆是），而舒巷城此一世代的出現，恰可以逐漸走出香港當代文學的一條本土道路。

據香港學者盧瑋鑾所言，「南來作家」（或稱為「南來文人」）作為一個特定群體的專門名詞，出現的時間並不久。香港文學史上的南來作家曾多次遷徙，自 30 年代、40 年代、50 年代、80 年代以來的作家群，每每可見其在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移動的身影。每個時期的南來作家來港時的原因與政治社會情勢，以及香港本身社會氛圍皆有所不同。⁵這些作家的政治傾向，有的偏向共產黨（如羅孚、阮朗、侶倫、葉靈鳳等），有的偏向國民黨（如徐訏、趙滋蕃、司馬長風等）；當然，亦有亂世流亡的文人（如張愛玲雖接受「美國新聞處」援助而寫作，但較難說偏於特定立場）。整體來說，大量的南來作家中實不乏文學名家與寫手，而媒體政治色彩則頗鮮明，因此，香港本土作家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乃可想見。

但正如同香港學者所言，這些戰後在香港活動的南來作家，都只利用當時冷戰下港英政府寬鬆的政治管制條件，在進行各自的文化與政治角

之「鄉土文學」概念可以概括，因此方以地誌及本土等概念來切入討論。見許翼心 Xu Yixin：〈香港「鄉土文學」芻論〉“Hong Kong ‘xiangtu wenxue’ chulun”，《香港文學》*Hong Kong wenxue* 第 56 期（1989 年 8 月），頁 7。

⁴ 蔡益懷 Cai Yihuai：〈吾土吾鄉：舒巷城早期小說中的本土情結〉“Wutu wuxiang：Shu Xiangcheng zaoqi xiaoshuo zhong de bentu qingjie”，《作家》*Zuojia* 第 13 期（2001 年 10 月），頁 135。

⁵ 盧瑋鑾 Lu Weiluan：〈南來作家淺說〉“Nanlai zuojia qianshuo”，收於黃繼持 Huang Jichi、盧瑋鑾 Lu Weiluan、鄭樹森 Zheng Shusen 合著：《追跡香港文學》*Zhuiji Hong Kong wenxue*（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n daxue chubanshe]，1998 年），頁 113-124。

力，「左右雙方都利用香港較自由的文化空間互相抗衡，但是關注的重點卻是中國，正如『美元（援）文化』的初衷也並非純為支持香港發展文化事業，目的是對抗中國傳播共產主義的影響。」⁶「香港」等於只是眾人暫歇、轉進時的踏板，而未必是終極的關懷所在。

因此，香港與香港作家便必須要在這樣的冷戰氛圍裡，辛苦地尋找立足本土的視角與園地。舒巷城等於是戰後第一代作家裡，自覺地發展香港本土文學特色的作家，且創作主題又不涉入過於政治性的議題，而能夠以清新的風格為香港文學傳下一線香。⁷

依照上述時代背景與作家社群的描述，香港本土作家的出現自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自 1950 年代初期開始，舒巷城創作數篇格外具有香港鄉土色彩的作品，如〈鯉魚門的霧〉（1950）、〈霧香港〉（1953）、〈香港仔的月亮〉（1952）等，都是以特定時空景物為背景的地誌書寫，當中不僅自然環境的描寫能夠彰顯香港的特殊風貌，這個作為「家園」的環境更是與主角的喜怒哀樂緊密相連。

及至 1960 至 61 年間寫的《太陽下山了》，這部長篇故事環繞主角成長的鄉土空間展開，背景亦正是戰後初期香港社會（小說的敘事時間由 1947 年開啟）。無疑地，這既是個人的故事，又是香港人的集體故事，因為小說中鋪展開來的乃是一幅有關香港底層社會的生活卷軸。

在諸多研究舒巷城的論述中，較側重在論述其作品風格上獨特的鄉土芬芳，或言其作為戰後首批本土作家出現於文壇的重要地位；相較之下，由香港文學史及作家精神史的角度，釐清舒巷城這種鄉土故事的發生學與時代意義，這類討論仍屬少數。因而筆者想進一步探問的是：這種重視本土、描摹地方的書寫特色，究竟是在何種個人與時代背景下孕育出來的？眾所皆知，戰後初期的香港，英國殖民統治依舊，以中國南來文人為主的文學場域裡，左右陣營的對峙使文學充滿政治意味固不待言，「香港」恆是統治

⁶ 張詠梅 Zhang Yongmei：《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Bianyuan yu zhongxin : lun Hong Kong zuoyi xiaoshuozhong de "Hong Kong" (1950-67)* (香港[Hong Kong]：天地圖書[Tiandi tushu]，2003 年)，頁 56。

⁷ 關於本土性，舒巷城老友韓牧先生曾說：「我素來重視文學藝術的本土性，恰巧舒巷城是個本土性強的作家，大眾公認，他自己也同意」。此「本土」的概念，自然是出之於香港文化的脈絡，理當回到小說家成長與書寫的場域中尋求解答。出處參見馬輝洪 Ma Huihong，〈師友情誼：訪問韓牧先生〉“Shiyou Qingyi : fangwen Han Mu xiansheng”，《回憶舒巷城》*Huiyi Shu Xiangcheng* (九龍[Jiulong]：花千樹[Huaqianshu]，2012 年 10 月)，頁 148-149。

者間的籌碼或戰利品，或是文人據之以為對抗的冷戰與內戰基地。香港本地的作家究竟如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訴說自我？也訴說香港的故事？

本文試圖考察，這種重新肯認「家」、「鄉」的書寫角度所形成的地誌書寫特色，地誌中對於「家」與「鄉」的描寫，究竟形成怎樣的藝術魅力？又要如何放置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初期的香港時代氛圍中加以詮釋，用以說明鄉土作家所展現之本土意識？文題定為「冷戰迷霧中的『鄉土』」，正希望將舒巷城的鄉土地誌之於自我與香港的意義再次喚起；同時，也要在冷戰迷霧的脈絡下，重新探勘小說家強調鄉土地誌與本土意識下的抵抗性與救贖性意義。

二、風景舊曾諳：⁸舒巷城關於「家」與「鄉」的地誌書寫

1950 年代伊始，舒巷城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山上山下》（香港：聯發書店，1953），是以早年的筆名「秦西寧」出版。在書封上就標明此書為「『香島風情』之一」，⁹可見描摹香港的「風情」乃是小說吸引讀者的重點所在。香島風土民情的描摹，似乎也成為舒巷城踏入文壇之初，便留給讀者的強烈印象。

本文不擬討論舒巷城為數不少之有關市井人生的小說，而試圖專注在其著力刻畫地誌、地景，以彰顯其鄉土文學色彩的篇什。這麼看來，舒巷城在 50 年代初期的幾篇重要作品，明顯地帶有「重識」鄉土故園的書寫企圖，但又因「物是人非」，觸動鄉情，遂同時帶著濃厚的抒情意味。小說人物與家鄉故舊的互動，在他的這批帶有地誌書寫精神的作品裡，表現得格外清楚。對舒巷城來說，人唯有在與鄉土契合無間時，才可能得到來自土地的召喚與救贖。

有關「地誌」（Topography）一辭雜揉了希臘文中的「地方」（*topos*）與「書寫」（*graphein*）兩字而成。就字源來說，乃是有關一個地方的書寫（*the writing of a place*）。¹⁰但這裡並不僅僅是想再現舒巷城在文本中提到的

⁸ 此句原出自白居易〈憶江南〉，實屬回憶之作，摘句以譬況舒巷城戰後回港的心境。只不過，白居易乃是在遠方回憶，而舒巷城則是歸鄉來印證這風景是否依舊。

⁹ 許定銘 Xu Dingming，〈舒巷城的《山上山下》〉“*Shu Xiangcheng de Shanshang shanxia*”，《香港文學》*Hong Kong wenxue* 第 203 期（2001 年 11 月），頁 73。

¹⁰ [美] 米勒 J. Hulls Miller 著，單德興 Shan Dexing 譯：〈第四章 地誌的道德觀：論史蒂文斯〈基韋斯的秩序理念〉〉“*Disizhang dizhi de daodeguan : lun Shidiwensi 'Jiweisi de zhixu linian'*”，《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Kuayue bianjie : fanyi, wenxue, piping*（臺北[Taipei]：

地名與地景，而是要探究小說家是如何運用地誌書寫來與他的小說主題、人物命運，甚至是文學風格，共同構築出舒巷城式的香港本土世界，一如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說的：乃是一種「地誌託寓」（topographical allegory）。¹¹

是以，無論地方風情也好，地誌書寫也罷，舒巷城最為人稱道的文學主題之一，就是他對香港地方風土的描摹。他的很多故事，都發生在成長之地四周，那既是家園，又是故鄉的土地上。如同論者所言，「地誌」概念的重點在於關注「現實影像和文學影像的關係」。¹²則舒巷城一再的描摹故園風情，是為了懷舊？為了寫實？或是為了某種理想？

筆者認為，觀察舒巷城關於香港故園的地誌書寫，不只是地景的重訪或覆按（一種紙上旅遊？），更要細察小說家書寫地誌與經營故事之間緊密的關連性。換言之，當舒巷城自「遠方」歸來，重新以香港為對象展現他的小說創作才華時，為何他會採取這般重新肯認的視角來描摹鄉土？他筆下的小說人物，置身在這樣的地誌裡，將會得到作家怎樣的安頓？

也斯（梁秉鈞）曾經獨具慧眼地引述舒巷城小說中「我是剛來的」的話語，不僅指出舒巷城小說的美學風格，也點出舒巷城面對作為鄉土、故鄉的香港時那種特殊的距離感：

不少論者把他稱為香港的寫實派與鄉土派。但如果細讀，就會發覺與同類作品相比，舒巷城的視野和寫法都不囿於狹義的鄉土寫實。由於閱歷和閱讀上的開展，他的小說正是有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不黏不滯。¹³

舒巷城 50 年代作品中的地誌書寫，與舒巷城多年參與抗日，以及浪遊各地工作之後歸來，應當有絕大關連。遠行後重新回歸故鄉，過往的風景

書林出版社[Shulin chubanshe]，1995 年），頁 82。

¹¹ 同上註，頁 85。

¹² 鄒芷茵 Zou Zhiyin：〈論香港文學下的「老灣仔」〉“Lun Hong Kong wenxue xia de ‘laowanzi’”，收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 Hong Ko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yuyan ji wenxue xi、Hong Kong jiaoyu daxue Zhongguo wenxue wenhua yanjiu zhongxin 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Doushi shenlou：Hong Kong wenxue lunji*（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un daxue chubanshe]，2010 年），頁 255。

¹³ 也斯 Ye Si：〈「我是剛來的……」：記舒巷城〉“Woshi ganglai de……”：ji Shu Xiangcheng”，收於思然 Si Ran 編：《舒巷城紀念集》*Shu Xiangcheng jinianji*（香港[Hong Kong]：花千樹[Huaqianshu]，2009 年），頁 208-209。

人事是否依舊？戰後的故鄉、香港對他而言似乎是「久別重逢」，於是乃有「我是新來的」這般的對話出現。這樣的話語同視角，卻並非意味作者對故鄉、香港的疏離，反而別有一種再次肯認鄉土之於自我意義的特殊意義在焉。

考察舒巷城的離鄉之旅，要回溯至 1941 年日軍佔領香港，舒巷城自 1942 年秋天隻身前往中國，一方面是參與抗戰，同時也是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這些「內地」經驗，都反映在 1971 年出版的《艱苦的行程》這部長篇小說裡。如同自述，舒巷城在戰爭結束後，尚且在「越南、臺灣、上海、東北、北平、南京」等地工作過，一直到 1948 年底才回港與家人團聚。

一位 20 歲的青年，歷經六年的奔波、勞動，待他回港時，故鄉的家園、香港的種種，於今究竟會有何種變貌？這無疑是 50 年代舒巷城正式踏入文壇後持續思索、反映的人生課題。

相較之下，冷戰時期的南來作家，他們所筆下的香港，正如黃繼持所言，50 年代來自外省的作者，「其中或遊離於香港社會本體與生活意識之外，或只邊緣相涉，而作品藝術亦多是中國三四十年代小說體式的延伸或摹擬，未必能夠開出本地特色」，¹⁴這些較屬於「在」香港的小說。

或如王宏志對香港文學定義的討論，相當敏銳也充滿本土批判色彩。畢竟，香港始終是各方人馬「過渡」的中繼站而非終點站。他因此認為：

儘管我們認定本土性（或其他相類的描述，諸如本土意識、香港意識、香港色彩、香港味道等等）是界定香港文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但的而且確，要界定甚麼叫香港的本土性，其實遠比界定甚麼叫香港文學困難得多，因為它自身便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並沒有甚麼可以具體體現的實體。¹⁵

¹⁴ 黃繼持 Huang Jichi：〈香港小說的蹤跡：五、六十年代〉“Hong Kong xiaoshuo de zongji : wu liushi niandai”，收於黃繼持 Huang Jichi、盧璋鑾 Lu Weiluan、鄭樹森 Zheng Shusen 編：《香港小說選（1948-1969）》Hong Kong xiaoshuo xuan (1948-1969)（香港[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Hong Kong zhongwen daxue]，1997 年），頁 V。

¹⁵ 王宏志 Wang Hongzhi：〈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Zenyang qu jieding Hong Kong wenxue : Hong Kong wenxueshi shuxie de yige zui jiben wenti”，《現代中文文學學報》Xiandai zhongwen wenxue xuebao 第 8 卷第 2 期、第 9 卷第 1 期（2008 年），頁 38。

雖說如此，相較於南來作家，舒巷城的地誌書寫並非只寫出些地名與人事，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風土地誌與本土港人的強烈情感連帶感，呈現為一種本土的情結。本節便希望先由地誌書寫切入，詳細體察舒巷城為自我、也為香港所挽留的地誌記憶。

〈鯉魚門的霧〉裡，一開篇就讓迷霧瀰漫在筲箕灣，也讓歸鄉的主角淹沒在迷霧中，兀自惆悵：

從四面八方，霧是重重疊疊地滾來的呀——
從清水灣，從將軍澳，從大浪灣，從柴灣，從九龍的山的那一邊，霧來了；霧集中在鯉魚門海峽上，然後向筲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的密密的網。——它包圍著每一隻古老的木船，每一隻身經百戰滿身創痕的捕魚船，每一面因沒有出海而已垂下來破舊了幾經補綴但只要扯起來時仍能禦風抗雨的帆；它包圍著每一隻上了年紀而癱瘓在水淺的地方的可憐的小艇，連同那原不屬於筲箕灣海面的僅有的幾隻外來的舢舨……¹⁶

為謀生而遠行的海員梁大貴，在離鄉 15 年後重新回到故里，迎接他的卻是這樣令人精神癱瘓的鯉魚門迷霧。

鯉魚門海峽，自 1950 年代就有「香港鎖鑰」之稱，進出香港的遠洋輪船都必須經此水路，軍事禁區也設在南岸。¹⁷但是北岸的漁村，卻因氣候與地理因素，素來貧瘠。舒巷城正是成長於這樣的環境裡。如同他另一部寫於 1958 年的《再來的時候》，也是以海員歸來為題材。〈鯉魚門的霧〉裡歸來的海員梁大貴，是海上的孤兒，父母亡故的他已然無家可歸，他真正要尋找的無非是一種歸宿感，卻不料已無人識得並未大富大貴的他。

在創作上稍晚於舒巷城出發的西西（1938-），也是 60 年代崛起的香港作家，她曾在《飛氈》（1996）這部小說裡，敘述父親花里耶回肥土鎮就要先問問「還有沒有蓮心茶的舖子？以及花順記荷蘭水店？」同樣是透過對地誌的運用，標明了小說人物確認自我與故鄉關係的過程。¹⁸因此，我們可

¹⁶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霧香港》*Wu Hong Kong*（香港[Hong Kong]：花千樹[Huaqianshu]，2000 年），頁 1-2。

¹⁷ 杰 Jie：〈香港的鎖鑰：鯉魚門〉“Hong Kong de suoyao：liyumen”，《中國學生周報》*Zhongguo xuesheng zhoubao* 第 251 期（1957 年 5 月），無頁數。

¹⁸ 陳綺婷 Chen Qiting：〈西西《飛氈》中本土意識和身分的建構與追尋〉“Xi Xi Feizhan zhong bentuyishi he shenfen de jiangou yu zhuxun”，《作家》*Zuojia* 第 12 期（2001 年 10 月），頁

以說，梁大貴之探問鯉魚門與筲箕灣的故人、舊土，特別是記憶中那來來去去的晨霧，同樣是藉由地誌與風物的書寫，刻劃主角尋找家鄉而無著的哀愁心態。

就舒巷城本人的經歷言，他並沒有失鄉的哀愁。但小說人物梁大貴之失鄉，卻恐怕是小說家對於重歸故里後，疑懼家園之美好記憶不再之下的一種確認動作。換言之，價值的確認、家園的重識，是舒巷城回港之後的作品試圖達成的目標。這樣來看〈霧香港〉這篇描寫男女主角無法相愛，似乎也難以維繫理想價值的作品，就更能理解小說中被濃霧所遮蔽的香港都會，連帶那位讓主角程方遠魂牽夢縈的女主角維維，同樣是有待確認的家園與價值：

欄杆外，是山腰，黑黝黝的樹，密密的房子……燈光透過的地方，是迷濛的霧；山下遠處的港岸和海給大霧纏結在一起；海連天，天連海；珠光寶氣的維多利亞城，今晚顯得如此失色；他噴了一口煙，但一轉眼，煙就消失於霧中。他整個人似乎都浸在霧中；他沈重的心——和身，給霧香港的霧拖著走似的，好像心——和身是不屬於自己的了。¹⁹

程方遠困惑的是，「為什麼，維維，一個像維維這樣的女孩子，不讓他愛她？」並且，維維還為了生計去從事舞女工作，「就這樣墮落了」。霧香港真是一個沒有理想之地嗎？程方遠不也是由夢想成為畫家「跳槽」而成為廣告公司的一員？艱難的世道令價值崩毀，霧中人歧路多艱啊！

關於舒巷城小說中反覆出現的「霧」，無論是鯉魚門等鄉間之霧，或是中區、灣仔等都市地帶之霧，論者陳智德將之視為一種悲劇性的霧，並以之為隱喻本土、鄉土原質的美好脆弱，甚至是文化的斷裂；或是代表新興價值、市場主流價值遮蔽下的香港。²⁰此說至為精當，已掌握到小說中藉由迷霧來渲染傷感氛圍的手法。霧中香港，誠可謂舒巷城最為迷人且知名的地誌書寫。

128。

¹⁹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舒巷城選集》*Shu Xiangcheng xuanji*（香港[Hong Kong]：香港文學出版社[Hong Kong wenzue chubanshe]，1980年），頁5。

²⁰ 陳智德 Chen Zhide：〈「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Xiang’ yu ‘cheng’ de jiuge：lun Shu Xiangcheng”，《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Jieti wocheng：Hong Kong wenzue 1950-2005*（香港[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9年），頁83-86。

但我們似乎也未必要這麼悲觀。舒巷城的霧除了是「迷霧」，其實也是鄉土中的「名物」，那霧既從未真正消散，也許生之悲喜劇本就無所不在，卻同樣可能在陽光下驟然隱去。舒巷城在 50 年代初期霧中的迷惘，與他回港未久，急於確認一切風物與價值未曾變化的心態有關。此與臺灣小說家鍾理和（1915-1960）自北平歸臺後，²¹在〈故鄉（四部作）〉裡對故鄉的破敗與迷信感到震驚，其感情結構似如出一轍。不過，到了稍晚創作的鍾理和《笠山農場》與舒巷城《太陽下山了》出現時，我們就可發現，他們對鄉土的愛戀終會克服他們的悲劇感，而致力於呈現充滿「向陽性」的地誌書寫。

循此價值確認、家園重識的視角來看，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這部 60 年代初期創作的作品，便可以由地誌書寫與觀看視角的轉移，看到舒巷城已非那個「新來的故人」，而是完全「恢復」鯉魚門、西灣河出身的男兒本色，為讀者提供來自鄉土撫慰人心的力量。相較於 50 年代帶有濃厚哀傷抒情、恍如外人的狀態，舒巷城在 60 年代的地誌書寫，顯示作家的創作主體經歷了重新契入鄉土世界後，極其積極與正面的觀看視角。

因此，就如同 60 年代出版的《太陽下山了》這部小說題目所示現的那樣：太陽下山了，可以是悲劇的象徵，有如前述迷霧所隱喻的那般；但日落則繼之以月昇，何嘗不是另一個希望的開始？舒巷城對於地誌的書寫，其實充滿了主觀的情感投射，並且是一種極其抒情而不失樂觀的主觀。試看小說第一章中透過孩子的眼光所見的鯉魚門日月景象：

每天早晨，太陽從鯉魚門那一帶的山上升起，然後慢慢向西爬行，然後下沉。孩子們說鯉魚門的太陽是全香港最大最美的太陽；自然到了晚上，也會說鯉魚門的月亮是全香港最亮最美的月亮。²²

²¹ 鍾理和在 1938 至 1946 年間幾次往返中國大陸，並在北平長住，1946 年方攜妻、子回臺。在北平期間曾出版小說集《夾竹桃》（1945），當中效法魯迅精神，對國民性問題頗多觀察與檢討。但戰後面對臺灣鄉土，鍾理和的啟蒙精神依舊，卻不再以強烈的批判立場描寫這些問題，其從「原鄉」到「故鄉」之間的思想轉變，可堪與舒巷城做一比較，更易看出遠行者歸來後的文學特色所在。相關研究請參考應鳳凰 Ying Fenghuang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鍾理和》*Taiwan xiandangdai zuojia yanjiu ziliao huibian : Zhong Lihe*（臺南[Tainan]：國立臺灣文學館[Guoli Taiwan wenxueguan]，2011 年）。

²²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太陽下山了（紀念版）》*Taiyang xiashanle (jiniannban)*（香港[Hong Kong]：花千樹[Huaqianshu]，2008 年），頁 2。

《太陽下山了》的情節重點，圍繞著孤兒林江的命運開展，他的海員生父死於海上，生母遠走，小學教師何通收養他，但不久亦病故。養母梁玉銀再嫁鞋店老闆林成富，卻使他飽受冷落。他因而浪蕩在西灣河的街頭巷尾，沈迷於講古和俠義故事，作家張凡則帶領他認識生存的目的。此後，隨著林成富死於車禍，他毅然擔起家庭重擔，與母親、異父弟弟一起努力面對生活的考驗。

小說最後一幕，原本隔閡頗深的林江與母親在相互坦誠一切後，兩人如同得到了新生的力量。當兩人走向歸途時，依然是太陽落下、月亮升起的一天。是的，其實也不過就是日常的一天，雖則人生總是如此漫長、崎嶇：

這時太陽早已下山了。月亮從鯉魚門海峽上升起。檔口上的火油燈、大光燈和月亮的光融成一片。²³

日月之光與檔口之光的交融，在人間性中注入理想性，這在舒巷城的地誌書寫中，乃成為他及他的小說人物繼續面對人生的動力罷！

三、冷戰下的本土意識：以記憶抵抗時代

雖然論者常謂，香港的本土意識與 1967 年的動盪事件息息相關，促使更多知識分子與市民關切自我的身份認同問題，當然也包括對香港歷史與地方的重視。²⁴然而，我們必須說，早在本土意識大規模的受到注目前，像舒巷城這般的作者，已經以作品而非論爭的形態，宣告了本土意識的出現。換言之，我們必須將本土意識的發展視為一種並非不辯自明，卻需要逐漸甦醒的過程，而舒巷城在 50、60 年代的作品，便恰如其份地讓我們看到作家對香港的認同意識，已出現與前此文壇中截然不同的端倪。

舒巷城關於香港底層社會的各種勞動者的關注，在他的地誌書寫中，便也同時展露無疑。或正因此，有論者將他歸入接近左派的作家，²⁵且他的小說集《山上山下》裡的作品皆發表在被公認為左翼報刊的《新晚報》副

²³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太陽下山了(紀念版)》*Taiyang xiashanle (jiniaban)*, 頁 230。

²⁴ 周麗娟 Zhou Lijuan:〈論香港「本土意識」的萌芽〉“Lun Hong Kong ‘bentu yishi’ de mengya”,《香港文學》*Hong Kong wenxue* 第 203 期(2001 年 11 月), 頁 54-61。

²⁵ 張詠梅 Zhang Yongmei:《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Bianyuan yu zhongxin : lun Hong Kong zuoyi xiaoshuo zhong de ‘Hong Kong’ (1950-67)*(香港[Hong Kong]:天地圖書[Tiandi tushu], 2003 年), 頁 220-224。

刊上。不過，舒巷城也曾在 70 年代受邀至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訪問交流計畫」，這卻又是個間接受到美國國務院資助的團體。²⁶顯然，左派或右派的媒體、團體，都能夠接受舒巷城這種重視香港底層民眾，而非只由階級鬥爭角度所描繪的港島風情。

張詠梅在論及被其歸類為左翼陣營作家的舒巷城時，認為與其它南來的左翼作家不同：「舒巷城在香港出生和長大，屬於比較外圍的左翼作者。相對於從中國南來，『新中原』心態較強烈的作者，舒巷城表現出對香港生活的熟悉和投入感，基本上他以本地平民百姓的眼光看香港。因此，他比較著意在小說中展現場景的地域色彩。」²⁷關於舒巷城的左翼傾向，並非本文重點。但由上述比較中，仍然可以區別出舒巷城所寫的土地經驗，乃是與土地與人物一同呼吸的經驗，並非只有將香港社會「背景化」而專寫人物受壓迫的經驗。也就是說，地誌書寫與下文中所要討論的本土意識，乃是一體兩面之事。以香港為家園，既是讓香港人受盡苦難的處所，卻也是不斷可以接納、撫慰香港人的居所。這種無法不以香港為「唯一」家園的意識，使舒巷城小說中的人物得以在無數的人生磨難中，始終能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

誠如陳智德論及「具香港特色」的本土性時所說的，60 年代青年在思考本土認同問題，本土意識的建立其實與當時對「民族認同」問題的思索不無相關：「五十年代初來港一代的『非本土』傾向、徐訏和力匡諸作者對『失去的國土』的認同，實建基於一種民族主義或國族認同。」²⁸因而，中國流亡者南下香港，除了自嘆華族花果飄零之餘，雖不免唐君毅所謂「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²⁹的那種自負與疏離，卻也意外留下香港本土意識尚未分明前有關香港文化的流亡觀點。因此，

²⁶ 鄭樹森 Zheng Shusen：〈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Yiwang de lishi, lishi de yiwang: wuliushi niandai de Hong Kong wenxue”，《從諾貝爾到張愛玲》*Cong Nuobeier dao Zhang Ailing*（臺北[Taipei]：印刻 [Yinke]，2007 年），頁 167。

²⁷ 張詠梅 Zhang Yongmei：《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Bianyuan yu zhongxin: lun Hong Kong zuoyi xiaoshuo zhong de 'Hong Kong' (1950-67)*，頁 224。

²⁸ 陳智德 Chen Zhide：〈「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Xiang’ yu ‘cheng’ de jiuge: lun Shu Xiangcheng”，《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Jieti wocheng: Hong Kong wenxue 1950-2005*，頁 28-30。

²⁹ 唐君毅 Tang Junyi：〈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Shuo zhonghua minzu zhi huaguo piaoling”，《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Zhonghua renwen yu dangjin shijie (shang)*（臺北[Taipei]：臺灣學生書局[Taiwan xuesheng shuju]，1975 年），頁 27。

也不妨說，50年代的香港文學，亦是在難民文學、流亡文學的大潮下，發展出南來作家對猶在英國殖民下的香港社會，一批有關流亡地經驗的作品。

香港本土作家自然不是流亡者，他們有真切的本土經驗，但卻可能缺乏更多的政治與文化資本，難於在冷戰時期那種政治大潮中，一時脫穎而出。不過，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舒巷城書寫土地經驗的諸多作品，也就默默地煥發出不同凡響的意義來，證明了香港作家自我認同與自我銘刻的方向所在。

然而，寫土地經驗，就具有本土意識嗎？這自然未必。但對舒巷城而言，面對不斷消逝的故鄉事物，以充滿感情的方式為之寫真留影，這個動作，像是一再確認此時與彼時的時空差距，似乎用以確認自己是否還身在鄉土，亦或是早已物是人非？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本土意識若放在50、60年代香港文壇左、右翼各擁立場，而英國政府以帝國利益出發、荒廢本土文化的經濟發展型態，這般的脈絡底下觀察，冷戰下的舒巷城之地誌書寫所煥發出來的香港本土意識，正亦不妨視為在左與右的思考外，另類的「第三路線」。除了上承戰前侶倫等作家開出的帶有歐化語法的鄉土書寫，同時也啟動了後續如70年代以降西西、也斯，以及新生代的陳智德、董啟章等作家對香港本土性的關注。他們的共通點是在香港本土意識上，乃是有別於國共兩黨的香港觀點，也不是西化的菁英觀點。

趙稀方曾經很明確地指出，侶倫的《窮巷》(1947)，黃谷柳的《蝦球傳》(1948)及舒巷城的《太陽落山了》(筆者案：此處「落山」應為「下山」之誤)，常被稱為戰後香港文學的三部鄉土文學傑作。但他進一步區別說，前兩部作品屬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舒巷城的作品則顯露出「本土品格」：

如果說，《蝦球傳》、《窮巷》帶有「鄉土」特色的話，《太陽落山了》則具有「本土意識」，它標誌著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³⁰

本文基本上肯定並延續趙稀方的看法，認為舒巷城1950、60年代的小說，為香港文學的本土性格奠下了基礎。不過我們仍可進一步探問的是：

³⁰ 趙稀方 Zhao Xifang：〈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從《蝦球傳》、《窮巷》到《太陽落山了》〉“Hong Kong wenzue bentuxing de shixian：cong Xiqiu Chuan, Qiongxian dao Taiyang luoshanle”，《世界華文文學論壇》Shijie huawen wenzue luntan 第2期（1998年），頁9。

這種本土性格的生發與演變，可有一個針對物？如果說當時左派作家描寫鄉土人物與鄉土問題，乃立基於欲實現其政治理想，甚或是政黨理念，對抗著右翼的政治觀念或資本主義現代性；則舒巷城的本土意識，以地誌書寫與人情百態所展現出來的香港本土性，他可有一個參照，甚至對抗的「異物」、「他者」？

袁勇麟曾提出小說中對都市文明的針砭，乃是以鄉土社會中的美善人性作為抵抗的力量：「他在《太陽下山了》中將目光聚焦於社會底層，不僅是為了表現鄉土社會在城市文明衝擊下的動盪，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那裡尋找溫暖而堅強的人性力量，作為對城市文明消極意義的反撥。這才是舒巷城本土書寫的重要意義所在。」³¹的確，將都市文明所帶來的問題視為「異物」，而可能對鄉土中的人性與價值觀有所損害，這無疑是舒巷城小說中本土意識的其中一個針對物，但其意識凝結而成的過程可能更為複雜。

〈霧香港〉裡的程方遠與維維，不就都是為五斗米折腰的香港庶民之一員。程方遠感嘆他被看作生意佬，而不再是寫畫的能手：

這些日子，彷彿沒有任何人了解我。莊家成，這個大撈家，更不用說了。嚇，他們只把我當做個生意佬，像他們一樣！³²

維維的信中，同樣坦露了身為舞女的無奈，但「跳槽」也是霧香港極為平常的事呢：

方遠，你跟我是童年時灣仔的舊街坊。你可記得當年教你寫畫的俞賓逢，你的第一個「先生」——他就是我的父親。——我們現在大家都是「跳槽」人了，不同的只是，我從這一家跳到那一家，你從這一個「理想」跳到另一個「理想」……³³

這種抵抗庸俗價值觀在意識上的無力感，與前述透過地誌書寫確認家園價值與認同卻不免哀愁的情緒一樣，都是 50 年代初期的時代產物，小說家等於自己也在面對著重新在香港社會生存所必須面對的挑戰。這種由生

³¹ 袁勇麟 Yuan Yonglin：〈那人、那巷、那城：重讀舒巷城《太陽下山了》〉“Naren, naxiang, nacheng：zhongdu Shu Xiangcheng *Taiyang xiashanle*”，《城市文藝》*Chengshi wenyi* 第 3 卷第 3 期（2008 年 4 月），頁 60。

³²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舒巷城選集》*Shu Xiangcheng xuanji*，頁 13。

³³ 同上註，頁 26。

活底層發出的掙扎與奮鬥之聲，作為一種本土意識，似乎在男女主角共同面對香港庶民社會的生存難題時，悄然地滲透在拜金時代的迷霧之中。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小說中所描述的問題，當時都市文明發展對於鄉土的損害，主要在於精神層面，鄉土還未因都市開發的擴張版圖而產生地景變化。³⁴但鄉土世界終有被都市文明所吞噬，地誌書寫成為明日黃花的一日，那已該是下一個世代香港作家的課題。³⁵

即便 50 年代初期的舒巷城不免於價值追求上的不確定感，就像〈鯉魚門的霧〉處理的雖然主要是一種價值的確認，但家園的重識同樣也是作者追求的目標。不妨這麼說，在霧香港或霧港灣的遮蔽下，即便遭遇多大的困苦，同時自己尚且沒有大富大貴，但〈鯉魚門的霧〉當中仍至少兩次強調，那艘破舊的小艇是我的「家」：

烏黑的泥灘上，有幾隻再不能下海而被遺棄在陸地上——泥灘上——的破舊不堪的小艇，他的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如果說他也有過家的話——就是在那樣的一隻小艇裡。³⁶

在那泥灘上（他怎能忘記呢？）他的守寡的母親在他未出世之前，曾為他安排過一個避風擋雨的家。縱然是那樣一隻破舊，齷齪的小艇，它仍然是他和他媽媽的家呀。³⁷

這種家園意識的強調，且不因其家的破舊而鄙棄之，無疑正是本土意識最佳的寫照。

如此來看，《太陽下山了》似乎更是以完整的鄉土構圖，將一個香港之子（鄉土之子）自立求生的故事，闡釋得淋漓盡致。筆者認為，這部作

³⁴ 趙稀方曾就舒巷城與海辛（1930-2011）小說中面對都市化的問題加以比較，認為「舒巷城對於香港都市的不適應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鄉村的香港則是他美好理想的情緒展現；至於「海辛對於香港的不滿則是現實的」。見趙稀方 Zhao Xifang：《小說香港》Xiaoshuo Hong Kong（北京[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2003 年），頁 201。

³⁵ 如林蔭（1936-2011）的《九龍城寨煙雲》（香港[Hong Kong]：獲益[Huo yi]，1996 年），就被論者稱為標榜一種「受苦式」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出現於描寫地誌快將消失或已消失的當下，並流露出對『過去』的高度信任」。見鄒芷茵 Zou Zhiyin：〈圍（遺）城記憶：「九龍城寨」的文學想像〉“Wei (yi) cheng jiyi: ‘jiulong chengzhai’ de wenxue xiangxiang”，《城市文藝》Chengshi wenyi 第 21 期（2007 年 10 月），頁 84-85。

³⁶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霧香港》Wu Hong Kong，頁 5。

³⁷ 同上註，頁 6。

品可以完全承繼前述回港初期重識鄉土價值的作品，卻又對本土價值因信心而生出充滿熱情的本土意識。因此，舒巷城最足以傳達本土意識的作品，同時也是最能體現香港文學、文化特點的小說，當屬《太陽下山了》無疑。

小說中對主要場景泰南街描寫的描寫，便在於揭示戰後初期西灣河一帶庶民生存的苦況。舒巷城對庶民的同情與理解，使整部小說洋溢著溫暖的人道主義色彩，同時，也再一次凸顯了他對香港的真摯情感。小說中寫到泰南街上的屋宇，雖高有三層，但都是三十年前的建物，屋裡面充斥著各種發霉的氣味。憑這氣味，你就認識到「這條窮街是的確住著一些生活在艱苦環境中的人。」³⁸夜裡的一場雨好涼快，在窮街的描寫過後，舒巷城以一種近乎祈願的心情，盼望雨夜成為人們休養生息的時光：

整條荒涼卻又顯得可愛的清靜的街，沈睡在愉快、安閑、夢一般的夜中。那兩根各自站在街頭街尾守著雨夜的街燈，默默地聽著雨聲，默默地祝福泰南街的人們今晚睡個好好的覺，明天起來和生活苦鬥。³⁹

小說中的孤兒林江正是這窮巷中的一員，但可能身世更為淒涼，因為他連親生父母都不曾得識。這讓我們想起〈鯉魚門的霧〉當中的梁大貴，也一樣是失怙失恃的孤兒。孤兒思緒總是格外敏感，但小說家讓他們充滿了面對生活的毅力與勇氣。立志要當作家的林江，把他對寫作的興趣，與他對窮街的體驗結合起來，陳述了他的「寫作觀」，他或許能寫出幫助人的張七皮與無錢醫病而死的朋友莫基仔吧：

寫作真是美妙的事啊。你把心裡的話寫在紙上，人家用鉛字印出來。人家在老遠的地方讀著鉛字，就讀到你心裡的話，……不，辛苦我不怕。慢慢來。我現在只不過十五歲。對啊，十五歲。我的學問不行。……慢慢學。……將來有一天……⁴⁰

馬輝洪曾指出，《太陽下山了》這部小說可視為以林江為主角的成長故事，而林江的理想乃是成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張凡引領林江對閱讀產生

³⁸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太陽下山了（紀念版）》*Taiyang xiashanle (jiniaban)*，頁 18。

³⁹ 同上註，頁 19。

⁴⁰ 同上註，頁 211。

興趣、對寫作懷有憧憬，無疑是把林江的關懷（「精神重心」）由當下街童式的生活，指向未來成為作家的理想——一個未知的領域。林江這種改變，無疑表現了他『自我的覺醒』。」⁴¹這種成為作家的理想，當然也可以視之為對抗庸俗讀物、都市文明的思考的反映。

不過，還有一個可能。林江的成長與自立，除了是一個孤兒的成長與自立外，是否也能用「寓言」的方式來解讀，而將之視為香港人在這座浮島上尋求自我認同的歷程呢？陳曦靜在其論文中，曾將林江以置身在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間尋找自我身分、自我認同的香港人為比喻，論證林江：「帶著建立了的價值觀，正式取代林成富，成為家庭新的經濟支柱。這種摸索、試探進而達成共識的關係，或者可以做為 60 年代部分香港人的寫照。」⁴²

這種帶有「國族寓言」式的解讀方式，也許不免將主角的種種行為泛政治化，以便能將林江的成長故事視之為香港本身的成長故事，仍頗有說服力。不過，我們或許可以不必如此「坐實」孤兒與主體的政治性意涵，畢竟以舒巷城一貫低調、溫和的陳述方式，則林江的成長故事與香港西灣河的地誌書寫，不妨視之為冷戰下香港作家的本土意識的進一步確立。捨此，便別無故鄉，再無鄉愁。

因此，筆者認為艾曉明所說，一種面對香港經驗的態度，可能更足以概括本土意識的針對性意義：

我認為這個小說最寶貴的地方是作者對這種獨自摸索的的認可，是作者的寫作態度，這不是對別處的遠眺和投奔，不是放逐情懷和鄉愁，而是面對香港的生活經驗，描寫這經驗，珍視這經驗。⁴³

⁴¹ 馬輝洪 Ma Huihong：〈理想的憧憬：論舒巷城《太陽下山了》的成長主題〉“Lixiang de chongjing：lun Shu Xiangcheng Taiyang xiashanle de chengzhang zhuti”，《香港文學》Hong Kong wenxue 第 310 期（2010 年 10 月），頁 91。

⁴² 陳曦靜 Chen Xijing：《舒巷城的小說研究》Shu Xiangcheng de xiaoshuo yanjiu（香港[Hong Kong]：嶺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Lingnan daxue zhexue shuoshi lunwen]，2002 年），頁 50。

⁴³ 艾曉明 Ai Xiaoming：〈非鄉村的「鄉土」小說：關於舒巷城小說的「鄉土」含義〉“Fei xiangcun de ‘xiangtu’ xiaoshuo：guanyu Shu Xiangcheng xiaoshuo de ‘xiangtu’ hanyi”，《香港作家》Hong Kong zuojia 第 115 期（1998 年 5 月），頁 11。

如果任誰都可以在香港來去自如，任何偉大的理念都可以無視於香港底層人民的心聲，那麼，舒巷城的地誌書寫所展現的本土意識，恰恰好是對照這種冷戰年代普遍的主流意識，一種堅定而樸實的聲音。東橙在評論舒巷城時便曾說：「舒巷城小說中鄉土的含義就是家園的概念。因為這裡既沒有鄉村也缺乏土地，和他的主人公命相依的是大海、海灣、街市，……」，⁴⁴就是這個以香港為「家園」的意念，使得舒巷城的本土意識找到了不需以任何意識型態話語來強加其上的存在意義。可以說，舒巷城的本土意識是無政治性的政治，但依然煥發著濃厚的自我認同意味，一種本土港人的矜持。

四、結語：鄉土之愛與鄉土之思

鄉土，既是展現舒巷城對成長家園的愛戀情感之對象物。鄉土，同樣也是展現他對香港這鄉土的命運思索的媒介。作為鄉土之愛的地誌書寫，與作為鄉土之思的本土意識，乃是二而一的產物。

筆者留意到趙稀方在評價侶倫的小說〈黑麗拉〉時，有一個特別值得討論的觀點。他認為：「人們注意到侶倫的小說中充滿著『異國情調』，但似乎沒有注意到它們僅僅是『情調』而已，種族矛盾從來沒有成為過小說的主線」。對於侶倫來說，「殖民性似乎是一個死角」。⁴⁵簡言之，趙稀方是試圖指出，反殖民未嘗成為侶倫反映香港社會時的焦點，而且是他文學的死角，似乎頗訝異於侶倫竟不曾積極抗英。

那麼，在英國人統治的港島大街或港邊排檔（路邊攤）當中，舒巷城的地誌書寫似乎也望不見幾個英國人；同時，他的本土意識似乎也總針對階級問題或雅俗問題，而不曾面向統治者，文本中的本土與殖民並不存在一種對峙的畫面。

或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鄉土文學傳統中，存在著一個非左翼、非右翼，同時又是殖民者缺席的鄉土空間。關於香港故鄉的書寫難道是去意識型態的產物嗎？以更高的文學純度，來表現作家對鄉土故園的情感與價值闡釋，這至少是 50、60 年代舒巷城選擇的書寫方式。

⁴⁴ 東橙 Dong Cheng：〈那人在燈火闌珊處：舒巷城和他的文學創作〉“Naren zai denghuo lanshan chu：Shu Xiangcheng he tade wenxue chuanguo”，《香江文壇》Xiangjiang wentan 第 7 期（2002 年 7 月），頁 54。

⁴⁵ 趙稀方 Zhao Xifang：《小說香港》Xiaoshuo Hong Kong，頁 48。

但，這當然並非意味作家試圖逃避政治。舒巷城亦絕非對政治於人生的干預視若無睹。⁴⁶本文的論證過程中，亦可以顯示出在冷戰時期那種充滿表態意味的政治式書寫外，如舒巷城這般較不使用政治語言的香港本土作家，其實亦不多見，何況卓然成家者。他的書寫風格。正是以有別於時人的作風，而逐漸為香港文學換來獨特的生機。

而後繼出現的新世代香港作家，如當年的也斯、西西等，在歷經 1967 年的事件後，隨著公眾政治意識與公民意識的提高，事實上他們的作品也都充滿由本土意識出發，帶有許多對過往、當下與未來的香港公共議題的政治批判意味，當然包括對掌權者的批判。這樣的本土意識，如果不上溯到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情結來解釋，則顯然難以說明戰後香港文學本土脈流發展的曲折過程。

舒巷城文學的意義，正在於默默地持守香港作為「家園」的基本價值。當意識型態話語在 1950、60 年代的冷戰氛圍中滿天亂飛之際，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便像是定風石與引路旗，他讓追隨者可以順著來路知道自己的身世。於是乎，讀者才能在每一次閱讀舒巷城的小說裡，一再確認家園香港的容顏，也就是確認故鄉的恆在，此在！

【責任編校：郭珈玟，李宛芝】

主要參考書目

文本

- 舒巷城 Shu Xiangcheng：《舒巷城選集》*Shu Xiangcheng xuanji*，香港 Hong Kong：香港文學出版社 Hong Kong wenxue chubanshe，1980 年。
- ：《霧香港》*Wu Hong Kong*，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0 年。
- ：《鯉魚門的霧》*Liyumen de wu*，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0 年。
- ：《太陽下山了（紀念版）》*Taiyang xiashanle (jiniaban)*，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8 年。

⁴⁶ 若看舒巷城的〈「這個黨」〉與〈立此存照〉等文，皆針對「六四事件」發表沈痛批判，便知小說家對現實的敏感度與批判性。文章收入舒巷城 Shu Xiangcheng：《無拘界（上卷）》*Wuju jie (shangjuan)*（香港[Hong Kong]：花千樹[Huaqianshu]，2011 年）。

——：《艱苦的行程（紀念版）》*Jianku de xingcheng (jiniaban)*，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9 年。

專書

秋明 Qiu Ming 編：《舒巷城卷》*Shu Xiangcheng juan*，香港 Hong Ko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1989 年。

思然 Si Ran 編：《舒巷城紀念集》*Shu Xiangcheng jinianji*，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9 年。

馬輝洪 Ma Huihong 編著，《回憶舒巷城》*Huiyi Shu Xiangcheng*，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12 年。

張詠梅 Zhang Yongmei：《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Bianyuan yu zhongxin : lun Hong Kong zuoyi xiaoshuozhong de 'Hong Kong' (1950-67)*，香港 Hong Kong：天地圖書 Tiandi tushu，2003 年。

趙稀方 Zhao Xifang：《小說香港》*Xiaoshuo Hong Kong*，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2003 年。

論文

艾曉明 Ai Xiaoming：〈非鄉村的「鄉土」小說：關於舒巷城小說的「鄉土」含義〉“Fei xiangcun de ‘xiangtu’ xiaoshuo : guanyu Shu Xiangcheng xiaoshuo de ‘xiangtu’ hanyi”，《香港作家》*Hong Kong zuojia* 第 115 期，1998 年 5 月。

馬輝洪 Ma Huihong：〈理想的憧憬：論舒巷城《太陽下山了》的成長主題〉“Lixiang de chongjing:lun Shu Xiangcheng *Taiyang xiashanle* de chengzhang zhuti”，《香港文學》*Xiangang wenxue* 第 310 期，2010 年 10 月。

陳智德 Chen Zhide：〈「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Xiang’ yu ‘cheng’ de jiuge : lun Shu Xiangcheng”，《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Jieti wocheng : Hong Kong wenxue 1950-2005*，香港 Hong Kong：花千樹 Huaqianshu，2009 年。

趙稀方 Zhao Xifang :〈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從《蝦球傳》、《窮巷》到《太陽落山了》〉“Hong Kong wenxue bentuxing de shixian :cong *Xiaqiuchuan*, *Qiongyang dao Taiyang luoshanle*”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Shijie huawen wenxue luntan* 第 2 期 , 1998 年。

蔡益懷 Cai Yihuai :〈吾土吾鄉：舒巷城早期小說中的本土情結〉“Wutu wuxiang : Shu Xiangcheng zaoqi xiaoshuo zhong de bentu qingjie” ,《作家》 *Zuojia* 第 13 期 , 2001 年 10 月。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論 1950-60 年代的香港作家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這樣的論述取向，在臺灣文學界比較多見，轉而用到香港文學的研究上比較少，從這個角度來說，本論文自有其創發性。

本文作者所能掌握的有關舒巷城的資料非常豐富，論述亦極流暢，比較可議之處是引他人意見太多，削弱了論述整體性，如何斟酌損益，非常重要。其次是，如何把舒巷城小說這種在地性放進香港本土文學傳統之中，去關注他對繼起者實質的影響性，這方面應該可以多一些筆墨。

第二位審查人：

本論文相當不錯，不論是敘述條理或表達見解，都值得肯定。本文作者認為「舒巷城文學的意義，正在於默默地持首香港做為『家園』的基本價值。」把一切喧囂的內外在世界，導引向簡淨的生機。如此層層推演的論證過程，頗富倫理之美，哲學之真。相較於當前學界的浮誇風尚，實在發人省思。舒巷城的出發——歷程——回歸，在香港文學史的開展脈絡上，給後來者安心地肯認自己的身世，確定故鄉的永恆。這樣的研究取徑，其實也可以對映到大陸、臺灣戰後文學研究，標識了某種不可或缺的真誠、樸實。